



普拉卡什·洛嘉尼采访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他对全球化负面影响的警告已证明具有先见之明

叛逆者

20世纪90年代初，在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的发展模式争夺中，市场主导的发展模式似乎大奏凯歌。苏联解体以及柏林墙的倒塌，导致人们对政府在管理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失去了信任。著名政治学者弗朗克·福山(Frank Fukuyama)1992年公开宣称，今后，民主和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的扩散将会导致人类发展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单调乏味”。市场的主导地位在众多经济学家中赢得了更多的认可。包括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在内的著名左翼经济学家也“不得不”对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等自由市场全球化的支持者“表示钦佩”。

不过，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拒绝加入这一阵营。相反，他警告，全球化——通过贸易和金融促使各国经济一体化的过程——可能已走得太远。他在自己1997年出版的一部专著中指出，经济学家们对全球化的乐观看法与许多“非专业人士”对全球化的“本能”抵制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他指出，美国“著名的共和党人”帕特·布坎南(Pat Buchanan)刚刚“雄心勃勃地参加了美国总统竞选，他提出了经济民族主义的纲领，许诺建立贸易壁垒和对移民采取更加严格的限制政策”(近20年后，美国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2016年争夺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中提出了同一主题)。

罗德里克对自由贸易所存在问题的告诫更明显地是针对经济学家，而非其他人群，他的告诫也被证明具有先见之明。他对资本在各国之间自由流动所存在的好处的质疑，

现已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观点。他对所谓“华盛顿共识”(有关推动经济增长的各项政策)的致命抨击，使得各国政府以及IMF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不得不承认，还有其他许多政策措施可以促进增长。“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决方案”(one size does not fit all)现已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短语，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罗德里克作品的影响。不过，《华尔街日报》前经济专栏作家、现在布鲁金斯学会哈钦斯中心工作的大卫·韦塞尔(David Wessel)说：“我们当时并不清楚他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

身居象牙塔

罗德里克绝大部分的职业生涯是在常青藤联盟的学校中度过的。他拥有哈佛大学学士学位以及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先后在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执教。

他之所以能够从自己的祖国土耳其到哈佛大学求学，离不开他的父亲——一名成功商人——的大力支持。20世纪70年代，与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土耳其实施了一项进口替代政策，即征收进口关税，来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而以国内产品取而代之。在进口关税的保护下，他的父亲所创办的圆珠笔制造公司取得了巨大成功，使得罗德里克得以有机会来美国求学。“我是进口替代政策的受益者”，罗德里克说道。

罗德里克写道，在申请哈佛大学时，他希望报考电气工程专业，而根本没有意识到当时哈佛大学尚没有这一专业。

不过，他最终还是被哈佛大学录取，原因是招生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在他的申请中“不知怎么地看到了一丝希望”，“在该委员会其他成员极力反对”的情况下力劝其他人同意录取他。

1975年，罗德里克进入哈佛大学。此后不久，他决定攻读政治学专业，并在“父亲的劝说下”决定辅修经济学。罗德里克说，他的父亲“当时仍然希望我能够上商学院，在一生中做点有意义的事情。”从哈佛大学毕业那一年，他仍“对自己未来的职业目标感到困惑”。之后，他申请了六个不同的研究生专业，包括经济学和商业以及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方面的课程。他最终选择了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和国际事务学院（Woodrow Wilson School of Public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公共政策硕士课程，并“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不过，他很快意识到，自己只不过是推迟了对事业方向作出选择的时间。选经济学，还是政治学，仍然需要作出决定。

对于最终“让这一选择尘埃落定的事情”，罗德里克至今仍然记忆犹新。某天，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他拿起了最能代表政治学和经济学两门学科的杂志——《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和《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前者的语言很好懂，而后的语言难懂”，也就是说，《美国经济评论》里零星分布有经济学家们喜欢的数学公式。他说，他意识到“如果我选择读经济学博士，我就能读懂两本杂志。但是，如果我选择读政治学博士，我就只有和经济学说再见了。这就是我当时的顿悟。”

1982年，也就是在他最初申请后的第二年，他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系录取。不过他写道：他之所以能成功地被录取，“更多的是出于（他人的）恻隐之心，而非（自身）足够的说服力。”普林斯顿招生委员会成员彼得·凯南（Peter Kenen）“独自一人负责我的录取”。招生委员会的部分成员担心罗德里克的数学能力，不过凯南力排众议，说服他们给罗德里克一个机会。罗德里克在读硕士期间曾上过凯南的课。

在普林斯顿学习期间，罗德里克在著名经济学家阿维纳什·迪克西特（见“趣味与博弈”，《金融与发展》2010年12月号）的指导下撰写博士论文。“我从未见过像他那样思维清晰的人，”罗德里克写道：“我以前写论文从未想过‘迪克西特会有什么看法？’”

1985年，罗德里克进入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执教，这也是他的第一份工作。除了1992—1996年期间在哥伦比亚大学以及最近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外，罗德里克过去30年一直在哈佛大学任教。也就是在象牙塔中，他对传统的经济学观点发起了挑战，改变了经济学界的看法，也使他一举成名。

对传统贸易理论提出挑战

经济学家们对自由贸易的一个核心看法是，它会带来

很多好处。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如果各个国家专门生产某些产品，然后通过进出口贸易来交换其中一部分产品，与各个国家独自生产所有产品相比，这种做法最终会使这些国家更为富有。不过，这也存在一个潜在的问题。当美国决定专门制作好莱坞大片，而不是生产纺织品时，纺织行业的工人就可能遭受损失。而贸易理论学家答复说，不用担心，我们的分析结果表明好莱坞电影制作商所获得的好处将足以弥补纺织工人所蒙受的损失。

罗德里克同时强调，贸易“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关系”。

然而，事实上，受损失者很少能分享到受益者的好处（经济学的术语为再分配）。罗德里克说，“迄今为止，经济学界还倾向于夸大”贸易所带来的好处，而对有必要进行再分配则只是说说而已。而传统的贸易理论认为，“净收益越大，（必要的）再分配就越大。认为收益大而再分配的量很少纯属瞎说。”

罗德里克在1997年出版的专著《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Has Globalization Gone Too Far?）中指出，未能认真推动收益的再分配，是导致经济学家和非经济学家对贸易看法产生分歧的主要原因之一。

同时，罗德里克列举了贸易所导致的其他几种冲突现象。他写道，贸易“暴露了那些在全球化市场中拥有取得成功的技能和能力的群体与那些缺乏这些技能和能力的群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裂痕”。那些没有上述技能和能力的群体如果不能接受再培训或者获得教育的机会，自然会抵制自由贸易，这是正常的。罗德里克同时强调，贸易“从根本上改变了劳动关系”。如果工人们可以不受国界限制，能更加轻易地相互替换，“他们的收入就会更加不稳定，与雇主的谈判能力也会被削弱”。此外，如果某个外国生产商的童工取代美国工人，贸易也可能“损害国内生产的内在标准”。

罗德里克最后得出结论，这些冲突所带来的叠加后果将最终使得那些从贸易中受益的人群与那些在贸易中遭受损失的人群之间出现“难以改变的新的阶级鸿沟”。

这部专著由国际经济研究所（现更名为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出版，并成为该智库最为畅销的书籍之一。该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C. 弗雷德·伯格滕（C. Fred Bergsten，见“美籍全球主义者”，《金融与发展》2012年3月号）说，“全球化走得太远了吗”这个标题是由他提出的，“取代了丹尼此前冗长而又非常学术性的标题”。不过，伯格滕不仅只是提出了标题，他还成功地让顾问委员会相信罗德里克的这部专著值得出版；顾问委员会的部分委员一度反对出版该专著，认为这将会让外界认为该研究所对自由贸易持反对立场。

罗德里克说，伯格滕在其他很多人不愿出手相助

的时候为他的事业提供支持，值得称赞。此外，罗德里克也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一家看似不可能的机构——IMF。1995—1996年，他在IMF担任访问学者期间撰写了专著的部分内容。“多年来，IMF向我提供的帮助一直让我感到非常的意外”，而“那部专著中的观点并非完全是从IMF产生的”。

对资本流动的管控

1997年10月，在中国香港召开的年会上，IMF提出了其观点，指出为什么各国不仅应该减少对贸易的限制，还应放松对资本在各国之间流动的限制。经济学家将前者称之为经常项目的自由化（或可兑换性），将后者称之为资本项目的自由化或金融全球化。IMF要求其成员国修改机构的章程，赋予其监督各成员国在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方面进展情况的权力。

此时，部分亚洲经济体正陷入金融危机之中，许多经济学家将发生金融危机的原因归咎于这些经济体对外资流动开放的决定。尽管这使得IMF的要求不合时宜，但时任IMF的第一副总裁史丹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仍然义无反顾地向前推进。他将资本项目自由化称之为“通往发展道路上必不可少的一步，这一点不可避免，必须采纳。”费希尔指出，资本项目自由化可确保“居民和政府能够以有利的条件参与借贷，由于引入了先进的金融技术，各国国内金融市场的效率也将因此提高，从而使得储蓄和投资得到更好的分配”。

事实上，即便在20年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时机仍未到来。

与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贾格迪什·巴格沃蒂（Jagdish Bhagwati）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一样，罗德里克也反对金融全球化。他认为，与外资进出引起金融市场动荡的风险增大相比，费希尔所提到的（资本项目自由化带来的）好处就变得黯然失色了。罗德里克说：“在国际资本流动中，经济繁荣和萧条的交替循环根本不是次要或微不足道的缺陷，而是主导事件。”

资本长期流向亟需这些资本的国家是否能为其带来好处，罗德里克对此也持怀疑态度。IMF主张，资本项目可以“有序地自由化，并且通过加强对金融活动的审慎管制，（向资本项目自由化）提供支持”。不过，罗德里克并不赞成这一看法。他认为，这种情况更多地只是出现在教科书中，而不是现实中。“将资本项目的可兑换性纳入IMF协议条款的时机尚不成熟，”他总结道：“我们目前没有证据表明它（资本项目自由化）有助于解决我们面临的任何问题，相反还有部分证据显示它可能使这些问题变得更加糟糕。”

事实上，即便在20年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时机仍未到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资本项目自由化带来的好处难以证实，而其带来的代价则是确凿无疑的。例如，2006年，时任IMF首席经济学家的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 Rogoff）与另外一名经济学家共同研究发现，很少有证据能表明一国在对资本流动开放后，其经济表现得到了改善。而另外一项研究则发现，外资的流入加剧了发展中经济体的动荡。继罗格夫之后，拉古拉姆·拉詹（Raghuram Rajan）担任IMF首席经济学家，他指出那些发展迅速的国家对外资的依赖性更小，而非更大。2009年，罗德里克在IMF出版的学术期刊——《IMF员工论文》（IMF Staff Papers）中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在外资流动方面，“更多未必就更好”；“根据各国及其具体情况的不同，政策的适当干预在推动外资流动的同时也会起到同样的阻碍作用”（见专栏1）。

终结“华盛顿共识”

1989年，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列举了10大政策行动，他认为这些行动概述了主要国际组织对于各国为了促进发展必须采取的行动所达成的共识。“华盛顿共识”这一术语——有时也称之为“新自由主义议程”——已经成为以市场为导向的整体发展策略。

罗德里克曾经说过，“当我刚开始批评华盛顿共识的时候，我认为我分析得很清楚。”在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罗德里克发表的一系列论文和专著中，他对华盛顿共识提出了三点不同的意见。首先，增长往往来自于将市场和政府角色融为一体的“折中解决方案”。其次，增长

专栏1

全球金融管制：少即是多

近年来发生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人们非常关注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并呼吁建立更好的全球金融管制体系。不出所料，丹尼·罗德里克成为此方面唯一的反对者。他写道：“全球金融管制既不切实可行，同时也不明智和不必要”（《经济学人》，2009年3月12日）。他认为，金融管制的最佳形式各国之间存在着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各国对金融稳定性与金融创新的重视程度。对杠杆进行管制、制定资本标准以及监管金融市场的职责应“完全由各国承担”。如同全球化制造商必须遵从各国制定的不同产品的安全法规一样，全球金融企业也必须遵从各国制定的不同要求。“如果全球经济建立在各国制定了强有力的法规，同时开展少量国际合作的基础上，而不是极力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庞大管制和监管框架的基础上，全球经济将会更加稳定和繁荣。”

往往是由一个或多个转变引发的,无需“很长的”改革“核查清单”。最后,促成增长的途径很多,而不是依赖于唯一的体制和改革措施。

罗德里克提供了许多同时依赖于市场和政府支持的国家在许多产业方面取得成功的范例。他指出,“哥斯达黎加并非生产半导体的天然场所”,但是政府“将英特尔引入该国,进行半导体生产”。他认为,有经济学家宣称政府不可能挑选出赢家,但历史记录并不支持这一观点:“当经济学家宣称这一观点的时候,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学的门外汉”。罗德里克说,更为重要的是“设计一种机制……赋予政府对失败者放手不管的能力”。

在其他学者提供的详细案例研究的基础上,罗德里克提供了其中一些范例,指出“各国要突然经历快速的增长,其实只需要采取很少的措施”。比如,毛里求斯采取的是建立出口加工区;中国采取的是引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双轨价格并行的制度;印度则是政府从对创业持极端敌视的态度转向支持创业。因此,各国要转向更高的增长率并不需要采取很多的行动。各国可以通过确定增长中存在的“制约因素”,并且通过采取“设计良好但相对较小的干预措施”来克服这些制约因素,从而促进增长(见专栏2)。

罗德里克指出,这些案例研究还表明,旨在刺激增长的“各种政策转变之间的共性很小”。这说明,促进增长的方式有很多,可谓千差万别。此外,对那些发达国家(包括日本、美国以及许多欧洲国家)开展的分析,其结果显示,尽管它们的机制和政策不同,但“也能最终成为富裕国家”。近年来变得更加富有的国家——绝大部分是东亚国家——也完全是“沿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前进,而非是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典范。东亚各国如果遵循‘华盛顿共识’等原则,现在的处境可能会非常糟糕。对于中国而言,如果被迫通过世界银行的结构调整贷款来启动其增长进程,情况也可能很糟糕”。

如今,“华盛顿共识基本宣告终结”,罗德里克说:“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为普通的方法”,该方法认识到“我们需要更多的实验,而不是共识”。

变革已成过去

罗德里克在哈佛大学的同事安德烈·施莱费尔(Andrei Shleifer)过去经常在走廊和他打招呼,问他“变革进行得怎样了?”1985年,当罗德里克刚开始其在哈佛大学的职业生涯时,他对那个问题的答案多少可能有些不确定。然而,30年后,显而易见,变革已取得很大的成功。

罗德里克对贸易负面影响及其可能导致出现阶级鸿沟的警告,已得到广泛认同。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前财政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在2016年4月的《金融时报》发表的文章中写道:“反对全球一体化的核心……并非是无知。人们认为全球一体化是由精英开展的,面向

专栏2

正确诊断问题

丹尼·罗德里克与另外两名经济学家里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和安德列斯·贝拉斯科(Andrés Velasco)共同提出了一个称之为“增长诊断法”(Growth Diagnostics)的框架,帮助各国确定需要采取哪些改革措施来促进增长。在2006年3月发表在《金融与发展》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三位经济学家写道,各国应确定阻碍增长的少数制约因素,并着力克服这些制约因素,而不是应对“一大堆必须的改革问题”。他们将该分析法应用于对萨尔瓦多的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阻碍增长的制约因素并非是储蓄资金的匮乏,而是“创新理念的缺乏”:该国的传统行业(如棉花、咖啡和糖生产行业)已经衰落,但针对其他潜在的投资行业方面则没有任何新的理念产生。他们认为,鼓励更多人创业和提供新的商机应该成为“(萨尔瓦多)发展战略的核心要素”。目前,世界银行和IMF都已将“增长诊断法”框架作为帮助各国制定增长战略的补充工具。例如,IMF于2016年将该框架方法用于对突尼斯的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该国的主要制约因素是难以“获得资金”,而非基础设施方面的瓶颈或缺乏人力资本。

精英的项目,而很少考虑到普通民众的利益,这一点并非毫无道理。”

罗德里克对金融全球化的警告已得到包括IMF在内的广泛认同。乔纳森·奥斯特里(Jonathan Ostry),IMF的一位副主任,近来负责该机构资本流动项目的研究。他说:“丹尼和IMF现在能对资本管控的设计开展有意义的对话,体现了丹尼锲而不舍的精神以及机构的灵活性。”

罗德里克对“华盛顿共识”的抨击,使得各个国际组织在向各国提供有关增长战略的咨询建议时表现得更为谦恭。罗德里克指出,2013年IMF发表的有关增长战略的一篇报告,就“恳请各国对其具体状况进行分析,其提出的解决办法也至少听上去令人感到高兴”。

罗德里克似乎更加热爱他以前总是抨击的职业——经济学家。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他的同事大多从事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两年后,他决定重操旧业。他的新书《经济学规律》(Economics Rules)入选《金融时报》畅销书榜单。该书告诉非经济学专业人士,“经济学领域有很多可以指责批判的地方,但也有许多值得欣赏推崇的地方”。■

普拉卡什·洛嘉尼(Prakash Loungani)是IMF研究部的处长。